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八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五一期 ——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8b)

---

【学术争鸣】希望更多的炎黄子孙参加文革资料库的建设 ——兼答余汝信先生	宋永毅
【读史随感】文革中的众生相	傅国涌
【峥嵘岁月】邂逅凶年——“五·一六通知”及其它	孔捷生
【史海钩沉】“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往事追忆】亲历文革若干事件	刘回年
【童年旧事】那座恐怖的桥	王永明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侯 5c 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w@cnd.org](mailto:hwxw@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学术争鸣】

希望更多的炎黄子孙参加文革资料库的建设  
——兼答余汝信先生

• 宋永毅 •

自我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下简称《光盘》）在去年年底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以来，得到了许多学者行家和普通中国人的热诚的鼓励支持和批评指正。如同我在〈总导言〉中指出的，出这样一个光盘的目的是在于“借助于现代科技”来试建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文革博物馆’”。〔1〕使我非常感动的是，不少学者乃至普通炎黄子孙在指出我们不足的同时，向我们无私地捐赠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为此，我们决定在2005年文革爆发40周年之际，推出光盘的修订版。把新征集到的近数百万字的资料编入。同时，我们还准备推出价格低廉的给个人使用的版本，以普及文革历史、揭示历史真相，帮助建立一个民族宝贵的集体记忆。在此，我也希望所有关心文革研究和文革博物馆建设的读者帮助我们的工作，如有当年的文革原始资料，请通过《华夏文摘》编辑部和我们联系，在此我先表深切的感谢。

余汝信先生对《光盘》的批评（见本刊上期 z k 0 3 0 8 a 余汝信：《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的几个问题——编者）我首先表示欢迎和感谢。从余先生的文章来看，他不仅对文革有一定的研究，而且手中有许多我们在海外没有的文革原始资料。在此，我真诚地希望余先生在学术讨论之余，参加文革博物馆的建设，或把这些资料捐赠出来，或公布于《华夏文摘》，以正历史真相，以饷万千读者，而不是藏之名山，贻误了它们的历史功用。

余先生此文的主旨之一，是执意于挑战据他说在一张商业推介单上“出版及发行者所声称的”《光盘》的“最权威性。”〔2〕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我和任何一个编者都从来没有声称过我们的作品有“最权威性”，而是老老实实地说明我们的资料大部来源于“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囿于能力，漏收漏选者必是难免”。〔3〕一篇针对编纂者的学术批评必须以编纂者的文字为准，把发行者的商业推销用语扯进对作者的学术批评不是一种严肃的行为。为了弄清事实，我还特地向香港中大要了那张余先生所称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库》推介单张”来看。看后我非常遗憾地发现：1）余先生的引证非但不全，而且擅自改动了原文；2）余先生搞错了这张商业推介单的出版单位。在推介单第4页的出版者落款单位处清清楚楚地印着“中文大学出版社”。在第1页下方又说明了该出版社的作用只“Distributed by”，即发行单位。余先生想当然地把它和出版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等同起来，实为大谬也。此外，推介单的原文是：“近年来有关研究文革最权威、最大规模的资料库”。余先生舍去了所有的定语和上下文，又私自加了一个“性”字，这实在是违在他的批评中一再倡导的“学术规范”。更为遗憾的是，余先生的这类“硬伤”的做法在他不长的批评中却一再出现。

余先生批评中指出的《光盘》的很大一部份不足，是我们漏收了不少重要的中央文件或附件，或没有按原件的格式。如1966年5月16日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我们漏了5个附件；同日的中发（66）26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我们漏了6个附件；再如，1967年8月10日中发（67）24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余先生指责我们略去了“任务区分”部份，它“内容详尽，共约1200字，占了全文50%以上篇幅，是文件的关键所在”。在此我要说明的是：事情绝非余先生主观武断地推定的我们要略去一点什么，或不愿意按原件格式编，而是我们手头的中央文件的翻印本并没有这些附件或内容（或是我们无法收集到这些文件的原件）。余先生手头有这些原件，而我们在海外踏破铁鞋都无法确证和觅到。举“5·16通知”的附件而言，我还专门为此讨教过在中共档案方面很权威的王年一和高文谦两位学者，除了我们已经编入的附件1，2外，他们也都记不得有什么其他附件。事可知之而为之，不可不知而强为之。说得幽默一点，这好比一个开崭新的凌志高级轿车的公司主管指责因经济拮据而只能开“二手车”的一般公司职员为什么不开他同样的车上班——显然这样的指责是有失公平的。对这一批评的唯一解决办法，我看只有请余先生公布这些原件和附件，来帮助我们纠正这些我们无法有所为的重要遗漏了。

除了上述两点的说明，对余先生批评中的不少学术见解我则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遵循学术研究的常规，写出来与余先生切磋商榷。

## 一，校勘：千万不要迷信中共的官方文件和它们的“第一手”的汇编

在讨论具体文件的校勘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因为余先生又一次采用“引证不全”和舍去所有的定语和上下文的方法曲解了我采用的学界通用概念，也使他自己的定义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我在《光盘》的〈总导言〉中指出：“汇编在这一光碟中的史料，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文革后与文革密切相关的文献，但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列”。（4）余文只引用了我的第一句而舍去了第二句，就人为地割裂了我关于“第一手”（Primary Resources）、“第二手”（Secondary Resources）资料的完整定义。无论是西方图书馆学还是中国传统文献学，对某一断代的历史文献的划分，都是以那一年代或稍后的原始出版物本身作为“第一手”资料（不管它们是当时翻印的还是今人编纂的），而把今人对这些材料的研究、评论，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访问和历史人物今天的回忆作为“第二手”资料。一本今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尽管它不是半个世纪前刊登鲁迅作品的原始报刊，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它不是“第一手”资料，而相反去认定另外一本今天“第一版”的《鲁迅小说研究》是“第一手”资料。简言之，我的划分是依据材料的性质，而余先生却把它曲解和简单化为印刷途径：是原印的，为“第一手”。如不是，则为“第二手”。如依这一标准，我们恐怕要宣布我们绝大部份诸子百家文献都不算“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了，因为它们许多不是当时由这些诸子百家自己刻印的。如老子的《道德经》，目下最早恐为汉本，距老子的年代少说说也有了百年。如按余文的标准，亦只能算为“第二手”资料。按余文的逻辑再进一步推论，汉代出版的对《道德经》的研究怎么算，算“第三手”？那么今天对汉代《道德经》研究的研究怎么算？“第四手”？“第五手”？……如此推理下去，只能使学术研究陷入不必要的混乱。

余文为了曲解我关于“第一手”“第二手”资料的概念，拖出了王年一先生作陪。余文说：“即便大陆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教授选编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亦未敢自称为‘第一手’资料，在出版说明中更提醒读者‘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在我查对了原文后，发觉余先生又一次采用了“引证不全”和舍去上下文的方法曲解了王年一先生的本意。以下是王著〈说明〉的原文：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汇编时，保持了文件原貌，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本资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5）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王文只是担心文件在翻印的印刷过程中出现的误讹，丝毫不涉及“第一手”“第二手”概念的讨论。在余先生舍去上下文后，竟变成了王年一教授申明自己的选本不是“第一手”文献的宣言，这实在离开他的本意太远了。

余先生在用他自定的标准批评了《光盘》第一部份后，又网开一面，说我的关于“第一手”“第二手”资料的定义：“对于《文库》第二至第七部份来说，大致是不错的，唯独对于文库的第一部份，该说法应有疑问”。这又使余先生的“第一手”“第二手”的概念陷入了进一步的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一部著作的编选和评介都不能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在《光盘》的第二至第七部份中，无论是毛泽东、林彪的讲话还是红卫兵大字报，许多都来自“群众组织出版物”，为什么它们就可以用另一个标准而唯独中共文件不能？例如，1966年12月5日的联动宣言就不是联动的原印本，而是来自其他群众组织的翻印件（用余先生标准的“第二手”材料）。如果余先生的本意是说：凡属中共中央印的东西都必须用特殊的标准。那又是否对中共过于敬重一点了呢？

余文还显示，他对于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校勘法”缺乏正确的理解，又对所谓的他认定为“来源最为可靠、最具准确性”的中央文件的“原件”、“翻印件”和“公开件”多了不必要的迷信。余文的不少主观推断只是对复杂的文革文件缺乏实际校勘经验的浅尝辄止而已。

余先生批评说：“对于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以至小报、传单，《文库》编纂者手中如果没有中央文件的原件、翻印件作标准文本核对，那是根据什么作标准的参照物去校勘、订正呢？没有原件以供核对，又如何去避免‘以讹传讹’呢？二手资料之间相互的增补、核对难道就可称之为‘校勘’吗？”中国文献学中的校勘，是指运用今人的历史知识和版本互校等等方法去纠

正文中的“误（字）”、“脱（文）”、“衍（文）”、“错（位）”等错误。（6）也许令余先生吃惊的是：校勘常常还是校出古籍中的原文错误。如今人陈垣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校出元刻《元典章》的误字；近人章钰采用各种宋本校订《资治通鉴》校出万字错误；此类例子实不胜枚举。

如果说上述校勘只涉及到古籍，那么我就用余先生一再强调的“5·16通知”的校勘为例，来说明“群众组织的出版物”的不可轻视。在编纂时我手头就有这一文件的“中央文件的原件（重印件）”，而且印者为最权威的“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1日印发）。这一文件非但没有任何附件，还把原文件标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改为“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也未作任何说明。另外，我还有几种群众组织的传单，但是它们无论在标题或附件上更忠于“原著”，至少有附件1和附件2。校勘的结果是：我们运用了群众组织的传单的标题和附件2。事实证明，它们更为完整准确。

余先生还认为：“而以文革期间的中央文件而言，‘第一手’的，应是中央文件的原件、翻印件，此外，文革期间大军区、省级党委和革委会等机关编印的文件汇编及完整的中央文件的复印件，亦可归入‘第一手’的范畴”，“如果编纂者手中的是第一手资料，那末全文照录可也”。这又是一个浅尝辄止的论断。上面提到的1967年8月10日中发（67）24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余先生武断地指责我们略去了“任务区分”部份。而我们的文本却恰恰主要出于文革中最为权威的汇编本之一：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1—7集）。该文件载于第3集第206—207页，原文就略去了“任务区分”部份。至于余先生文中推崇的另一个“第一手”资料集：湖北省革委会1968—1969年间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这一文件更只有第四条，标题也简单地改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而不加任何说明（该文件载于第2集第427页）——由此可见，余先生所十分推崇的“第一手”资料也并非处处完整可靠。至于我们在校勘中发现的这类“第一手”材料中的“误（字）”、“脱（文）”、“衍（文）”、“错（位）”等错误，有时并不比“群众组织出版物”更少，实在不能盲目迷信。

## 二，编选：切忌单一的选家标准和尺度

余先生在批评中说：“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文革资料的选取，应围绕政治斗争的主线。《文库》的编纂者未有掌握好文件的入选尺度，相当一部份文件无关宏旨，如关于中小学放寒假的，恢复职工探亲假的，职工转正定级问题的，调整银行利率的，选进来实无必要，而一部份关系运动全局的、关键性的、相当重要的文件却没有登录”。前面我已经说明，对余文所言的“相当重要的文件”我们不是不选，而是没有，这有待余先生的贡献。至于余先生要求我们只选与“政治斗争”直接有关的文件，又是一种我无法苟同之见。文革固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它又何尝不是一场失败了的“教育革命”和劳工、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当一部份出于余先生个人的研究兴趣被认定是“无关宏旨”的文件，对从教育、金融等体制变化来的角度研究文革的学者来说，却显得“太关宗旨”。另外，对一场历时十年、深入千百领域的民族灾难，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和研究，未免过于狭隘。而编纂这么大的一个资料库，只用单一的选家尺度，更未免作茧自缚了。

对于余先生批评我们自拟标题一说，我认为今后如有可靠的红头原件，应当加以说明。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为余先生推崇的中央文件原件、翻印件或“第一手”的汇编，在同一个文件上都往往有多种不同改动过的标题。在不同的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上，不同的标题更是林林总总、洋洋大观。我们的资料，绝大部分不是档案馆里的原件，因此无从断定那一个是正宗，那一个是脉流，实有无从说明之感。另外，余先生批评的有些例子，标题并非我们自拟，而是原来的版本中就有，并无甚不妥。举1967年6月25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通

知为例。余先生认定“编纂者自拟标题为‘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冲击军委文革小组驻地的通知’。”其实，这一标题来自一个群众组织出版物，并非自拟。另外通读一下以下的全文，倒也觉得颇切中题意：

“军委文革小组是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担负着坚决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军委文革小组办事机关是军委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是军事领导机关。为保证领导工作的正常进行，特作如下规定：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八项命令，十项命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

二，三座门三号是军委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许冲击。

三，来访人员一律到军委文革小组联络站接谈。

四，任何组织，任何个人绝对不许可揪，斗办公室和联络站的工作人员，要找什么人谈问题，由联络站予以接洽安排，不能随叫随到，不许可限制他们的正常活动。如对工作人员有意见可以提出。

五，军委文革小组联络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是军委文革小组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意见的办事机关。联络站工作人员，对来访群众要热情接待，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联络站只有听取群众意见的义务，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来访人员，必须遵守联络站的工作制度，保持联络站的正常工作秩序。

以上规定，望切实遵照执行，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此通告同样适用于各总部，各军区，各军种，兵种的文革办公室。”

此通告由当时的军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文革小组驻地引发，全文重点在于“不许冲击”。而余先生建议的标题，虽然也可行，但一没有版本可据，二显得不及原标题那样切中题意。

关于一些文件的“概要”，自然是因为无法征集到文件原文的不得已的做法。是否要把这些“概要”列入，我们事先征求过不少美国的文革研究者的意见。他们的一致看法是：“要”。理由是这可以给他们的研究作很重要的参考，有时甚至列入一个“存目”式的标题都有用。为慎重期间，编者还访问联系过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写这些“概要”的编者。（7）在确定他们决没有出于政治原因曲解原文后才使用。余先生认为他们的“概要”写得不好，但我又没有原文，这里就不好作进一步评判了。

关于《光盘》中的全部文件资料未注明出处，余先生认为是“有违学术规范要求”。其实，无论中西学界，在编撰大规模的资料选本，来源驳杂又经过了大规模的校勘工作。为了避免烦琐的、有时甚至比原文还长的校注，都有在〈前言〉中作一个总说明而不是篇篇注明出处的。我案上有一本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在〈前言〉中简要说明了所用的多种版本后，就一篇也没有注明出处。就理由而论，胡先生认为：“作品原文，各本多有异同，真伪难以辨别。本书不作烦琐的校勘，所录不主一家，择善而从”。（8）胡先生的这个选本至今在中美的中文系和东亚系中作为学宋词的主要教材使用。就文革文件资料而言，海外的不少英文选本和译本，更都有作一个总的说明，而不再一一注明出处的。（9）由此可见，这一做法未必“有违学术规范要求”，而是遵循了前人的某种学术规范。如果余先生认为这种“学术规范”不好，我也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另外，就我本人在编选中的实际经验而论，全部注明出处也无法推行：1）不少群众组织出版物连出版者都不清楚，无从注明；2）不少海外收藏家提供的只是一个手抄本，也没有日期和出版者。出于对安全问题的考虑，他们更要求我们不要注明任何来源出处；3）一个校勘过的文件，有时原文中错字的改动涉及到好几个版本和历史知识的推断，而文件号又甚至来源于今天的一本回忆录。所有这些需

要非常长的注才能说清楚。

### 三，批评：不能用“想当然”来代替真凭实据

在一篇涉及历史文献和校勘的批评文字里，千万不能用“引证不全”、“舍去上下文”等方法来支持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更不能用主观猜测的“想当然”的方法来代替真凭实据的论证。令人遗憾的是，在余文中除了我已经指出的“引证不全”、“舍去上下文”等问题外，“想当然”式的“硬伤”也不时可见。下面仅举几个例子：

其一，余先生在谈到“5·16通知”报上公开发表的“公开件”和原件的区别时说：“如‘5·16通知’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1967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修改或添加的文字特别以黑体字排印，而1966年的原件并非以此形式排印”。话锋一转，他又批评我们没有“加上简要的注释，如‘5·16通知’”，因为“原件与公开件的差异处即应加以说明，可惜，《文库》的编纂者并没有这样做”。换句话说，余先生已经主观地断定我们用的是报上发表的“公开件”了。然而，《光盘》对该文件中“1967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修改或添加的文字”并没有用“特别以黑体字排印”。余先生凭什么进行“想当然”的批评？该文件的“附件2”从来没有公开过，而在《光盘》里有，余先生也已经在他的文中讲到，那又凭什么再作这样的自相矛盾的主观论断呢？

其二，就《光盘》登录的1968年6月10日所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余先生批评我们“未辨真伪，错误地登录了来源可疑的伪造文件”。此件是否伪作，下面会继续讨论。但问题出在余先生用以论定的主要论据，又是“想当然”式的臆想。余先生论定这是出于“台湾方面为其需要有目的地伪造一些对中共不利的文件，投放到大陆地区以制造更多的混乱”。请问余先生有何证据？是否又是一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式的主观武断？《中共研究》是台湾的一本严肃的政治学刊物，它编选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出版于1973年，只发行于海外。（10）余先生有什么证据说它曾经投放在云南，而且时间是在1968年，目的是“以制造更多的混乱”？因为台湾当时的反共法令，那里出的大陆资料把“毛主席”改为“毛XX”；把“国务院”改为“伪国务院”本不足为奇，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必然产物。但我们在选用任何《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中的文本时，都发觉它们来自大陆的群众组织出版物，而非凭空捏造。具体就这一文件而论，我们也看到过内容相同的云南省的传单。因为没有“注意事项”，我们在校勘后便删去了那一部份。对该文件的真伪，当时《光盘》编委会内也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对“地方驻军”与“中央支左部队”的提法，我甚至问过参加过云南文革的朋友。据他们告知：在云南这一说法当时并不为奇。因为这可能是一个电话指示，在流传中的词语也有可能改变得更口语化。为慎重期间，我在2000年11月去台湾大学访问时，还专门去新店市访问了《中共研究》当年的编者。他们也都肯定该文来自大陆群众组织传单。在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此文为“台湾伪作”的情况下，我们就编入了。自然，因为自己的史识不足，在近万篇的文革文献中一定会有搞错的现象。就这一文件，我也愿意和各位行家继续讨论，以纠正可能的错误。

然而，问题在于余先生的论证。在论及该文时，余先生提到了他的中共档案馆的知识，他断定：“在大陆各档案馆存档目录中，从未发现过该没有发文编号的文件。”我不清楚余先生到底跑了多少家中共的档案馆？都是些什么级别？对于中共档案馆的收藏，笔者讨教过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他曾在中央档案馆里泡过多年。据他说：中共档案馆的目录都按保密级别分为好几种。我不清楚余先生是否到达了最高的级别，如果还没有，请不要用太大的口气说话。至于文革中流传的文件，甚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编印的文件集，都没有文件号。余先生自己也正确地指出：“第5、6类缺点是部份文件是节

选的，大部份文件未注明文号”，这里凭什么又把它自相矛盾地作为断定一个文件是伪作的主要依据呢？

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资料的收集和版本校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对此进行的严肃的学术切磋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最后，我在此再一次向余先生的批评指教表示感谢，并再一次真诚地希望余先生在学术讨论之余，参加文革博物馆的建设，或把那些《光盘》中没有的资料捐赠出来，或乾脆公布于《华夏文摘》，以正历史真相，以饷万千读者，而不是藏之名山，贻误了它们的历史功用。我的答词中如有不敬之处，也望余先生多多谅解。

注解：

〔1〕《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目录索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第〔4—5〕页。

〔2〕在余先生“初稿”中把这个无中生有的“最权威性”说成是“编纂者声称”。因为余文批评的是我编纂的第一部份，这自然会使人想到是指我“声称”。我在收到《华夏文摘》编辑部请我作答的批评初稿后，通过编者婉转地转告余先生我从未没有讲过这类的话，希望他不要把发行机构的商业用语强加于对我的学术批评。后余先生把它改成了“出版及发行者”，但对于他自己修改添加过的“最权威性”一词仍执意不肯放弃。

〔3〕同〔1〕，第4，5，6，43—44页。

〔4〕同〔1〕，第4页。

〔5〕王年一选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第1页。

〔6〕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1—171页。

〔7〕《光盘》中的概要部份，大都取材于陈东林、杜蒲主编的《共和国史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东林、苗棣和李丹慧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福岡市：中国书店，1996年。高明振和黄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3—4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和一些领导人年谱等。

〔8〕胡云翼选注《宋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23—24页。

〔9〕如现在西方学界还常用的 James T. Myers, Jurgen Domes 等著名文革研究学者编的 Chinese Politics: Document and Analysis. 2 vol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6 就仅作一个总的说明，而对所有来自民间的中共文革文件均不注明出处。

〔10〕1973年4月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原名为《共匪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如同大陆把国民党长期以来称为“蒋匪”一样，这和文件的真伪没有关系。

~~~~~

【读史随感】

## 文革中的众生相

• 傅国涌 •

文革时曾红极一时的人物王力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虽然思想仍僵化如昔，但他对中共高层权力运作内幕的大量披露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王力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十月出版）是他晚年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与反思，虽然他至死未能摆脱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

袖”的忠诚与膜拜，但他曾亲历“文革”早期及“文革”前重大场合，自一九六〇年起他就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四年起他还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更是红极一时，他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受伤回京曾享受百万人欢迎大会的殊荣，一转眼就被打倒，在秦城监狱度过了漫长的十三年半。他与毛泽东等有过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了解最高层权力的许多内幕，他以劫后余生留下了《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不仅对研究文革史有着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对解剖数千年相续的中国政治史、政治文化以及中共权力斗争史等都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

王力身历“文革”最初的一年零两个月，却是最重要的阶段。读他的回忆录，让我感受最深的两点是：

一、权力没有限制、任意妄为，甚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本人也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九八〇页）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曾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甚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七〇六页）

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七一二页）“中央文革小组”越过政治局乃至常委会，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说：“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七一六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即使号召夺权，也“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份地夺。”（八〇四页）

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不能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对王力说过，“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指挥。”

无限权力滋生造神运动，王力多次讲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挤死好多人。“那天踩死的将近十人，踩伤的上百人，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肋骨挤断了三根。”个人崇拜之狂热可以想见。也是那天，毛对身边的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二、以往人们总是以中国传统的“忠”、“奸”观念来评价“文革”，好像发生“文革”这样空前的浩劫是因为几个包围着皇帝的奸佞小人（林彪、“四人帮”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对面的是一大批忠臣，如处境艰难的周恩来，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帅等等，他们显然是反对“文革”，早就洞察到了奸臣们的阴谋，并与之进行了“斗争”。从而把甚么责任都往“奸臣”、“坏人”身上推。其实，这只不过是虚构的观念化、脸谱化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王力这样说：“当时自己觉得总是要跟毛主席干革命，防复辟，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



没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他对“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但据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过他不赞成“砸烂”、“火烧”等这些口号，但也说：“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学习林彪，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因此王力这样说：“历史学家认为他就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陈毅有个讲话甚至称“林彪是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至于徐向前当过军委文革组长，那是稍知“文革”史者都了解的。

王力评价“林彪不是不读书的人，他还做卡片。他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说话，说话都是有份量的，他认为对的，还是坚持到底的，当时他的威信还是很高的”。这也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恶、不学无术的林彪不一样。在王力看来，并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坏人，“文革”并非“不是毛主席发疯了，再有几个坏人，就把事情搞坏了”。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在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反对，对夺权也没有反对，还是认为不夺权不行，不夺权就要改变颜色了。认为刘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国家要改变颜色了。”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文革”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如果权力仍然没有制约，如果权力的产生、运作、更替和监督没有制度化、公开化的程序可循，一切都在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转动，难道我们敢轻易相信：“文革”真的过去了？“文革”不会再来了吗？

□ 原载2003年7月号《开放》月刊

~~~~~

## 【峥嵘岁月】

### 邂逅凶年——“五·一六通知”及其它

• 孔捷生 •

指顾之间，三十年过去，文革仍如沉重无比的石碾，反复碾压着人们的记忆。

我却试图在尚未发黄发皱的史页中翻寻出别样的情致来，“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这句话大抵是不会错的，唯其如此，从沸点蒸发出来的故事才教人觉出革命的可悸。时代狂澜是如此浩大，弱水三千，我便只取一瓢血腥味最淡的，说说一个校园少年在灾劫边缘彷徨踟蹰的旧事。

## ◇ 天象

1966年五月下旬，学校里应是一个紧张的时段，本学期课程已授完，大约有一两个星期用来复习各科功课，准备期末考试。这是我上初中的头一年，想拿下“满堂红”的决心是有的。本人平时成绩得过且过，大考却是要好好磨枪，见个真章的。这天才入校门，却传令紧急集合，全校列队打着校旗出发，开赴指定的会场——“中苏友谊大厦”。一路均见旗帜飘飘，队

伍往还。原来是全市的学校总动员，划定很多个集结地点，听取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作者记忆恐有误，“五·一六通知”要到1967年才公诸于众。——编者）

其实，在校听广播又有何不可？这般造势，想必是“大阵仗”了。本来那些年运动已是常态，但全校拉队外出，仅有过一次“抗美援朝”的各界大示威，平时无非是校内的操场上“忆苦思甜”和宣讲“阶级斗争”，杏坛向着革命的香坛靠拢，但书还是要读的。大考在即，拉队出去转悠转悠，倒也别开生面，松弛一下绷紧的神经，于身心有益。

到达会场，所有空地都已铺展成人海，中学、中专、高等院校，红旗掩映，蔚为壮观。这不过是诸多会场中之一，中心会场在海珠广场，那边不知是何景象？

昂扬地翘向天空的高音喇叭全城同步开播，宣读着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空气仿佛也在那铿锵有力的声波里振动。如此氛围，大家神情都一派肃然。不过，没一个人真正晓得它的意义。运动要来了，固然会忙乎一阵，学生总要考完试，放过暑假，再来运动运动。

说来也巧，“通知”才读了一半，突然天昏地暗，阴霾四合，那低低压下来的天幕，呈恐怖的浊黄色，风于是也来了，似是平地卷起，飞砂走石，旗林也东歪西倒。教师们更紧张地逡巡着，唯恐本校队伍散乱走避，各个学校都列阵于此，正是检阅校风的时刻，怎可在人前“掉了份儿”？其实未免多虑，学生都受过军训，晓得什么叫“雷打不动”，便都笔直地戳在那里，如非广播仍在响着，大伙儿还会齐吼起革命歌曲，向邻校叫阵，“一二三，来一个！”之类。奇的是，风云突变，雨点却没掉下来，竟让各校师生纪律性与意志力的竞赛未能一较高下。天就这么阴着，风就这么刮着，五·一六通知依然响着……只是经此骤变，恐怕大多数人都在顾盼风景，听觉已不能在高音喇叭上凝聚了。事毕拉队回校，“通知”到底讲了些什么，就算最认真听取的人，亦不甚了了——然而，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纪元在风驰云走之中揭幕了。

接下来，学校宣布停课三天，搞“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老师们作布置时，神色凝重，他们自然都不曾预知自己的命运，只是极力掩饰着对未来考试成绩的忧虑。

三天很快过去，并没有复课。试也不考了……一拖就是十年。我永远无法知晓自己仅有的那一年的初中学业的成绩，只记得，一切都是从那个天昏地暗的白昼开始的。

#### ◇ 世相

“斗争会”来了。说来，学校的教师们用不了多久几乎都得斗一个遍，能幸免进牛棚的少之又少。不过，当初第一个斗争会还是有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谁也不知文革该怎么搞，牛鬼蛇神该怎么揪斗。所以斗争会采取“半封闭式”，并非在操场上，而是在体操训练房里进行。参加人员也筛选过，主要是高年级一些觉悟高、斗争性强、最早组织红卫兵团体的革命骨干——其实在文革之初，这些都是又红又专的好学生，多是共青团员或学生干部，亦即后来的保守派，他们的革命法统地位，未几将让位于造反更果决、斗争更勇悍的别一批人——小小一间体操房，无非挤得下百来号人而已。上台揭发控诉者，当然也精选过，都是初三以上的“成熟”学生，唯独我们初一六班全体参加，原因无它，第一个挨斗者，正是我们的班主任。

班主任梁老师是教代数的，人到中年而已，却在这一行里颇有名气。何以第一个被揪出来，至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梁不是老气横秋的教书匠，他有办法将抽象的方程式变得趣味盎然，他性情活跃，还是教工篮球队的主力，他擅长远投，出手角度与抛物线的轨迹都是经过数学计算的，自然要比人家精确。如今被揪出来，我也在脑海里努力编织拼凑他的罪行，却苦于无迹

可寻。我跟他倒是别有一些纠葛，因为初一第一个学期，我被他选为代数“科代表”；第二学期我的代数成绩下降，便被“递夺”职务。如果一个人本来什么也不是，那便无所谓，糟的是你曾是而又被摘去“花翎”，多少是会有点不快。但除此以外，也实在想不出有何宿怨可煽起我“斗争”的原冲动。反正，上台呵斥是轮不到初一生的，倒是让我们开了眼界。

这轮斗争会即使臻达最高潮，亦比后来的场次要斯文得多。怒吼自是免不了的，口号很激昂，控诉却很空洞，大约是曾经他调教过的、已升至高年级的学生揭发他鼓吹“白专道路”，在何年何月讲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何时何地又讲过他辅导的代数竞赛小组得过全市第几名，等等。梁老师被按低了头接受批判，并未五花大绑或挂黑牌。气氛渐地有些无聊，于是彩排过的高潮就来了。这时一位高一女生上台，未开腔就被组织者领喊口号，“欢迎X X X同学勇敢揭发！”大家莫名其妙地跟着鼓掌，那女生的脸蛋竟有些泛红。于是，她控诉说：某夜她上梁家接受数学补习，临走时梁突然灭了灯，昏暗中梁对她作出猥亵的手势……。女生很漂亮，而且她揭发时的羞涩与窘迫，怎么瞧也不象是假的。只不过，她要抖落的内容显然已被组织者事先获知，正等着这一华彩段落。果然，此言一出，即刻擦燃了众人的道德火花，人人双眼充血，吼叫声格外宏大起来。有一粗嗓门喊道：梁X X，跪下来！一瞧，却是个教师。

参加斗争会的仅有几位刚分配到本校一两年的青年教师，他们原来就是党团骨干，从业时间短，来不及“反动”起来。最了不起的，是一位来自武汉体育学院的翁老师，他曾陪过毛主席畅游长江，大概是在最外围的安全警戒线，但这本儿已够他吃一辈子。此后他不但与牛棚无缘，更是各派争相“结合”的对象。不过，翁老师人很老实，其后漫长的文革岁月都未闻他有何劣迹。此刻大呼小叫的是一个教政治的李老师，他原兼任学校民兵营的教导员。那些还来不及佩戴红袖章（当时尚不大清楚袖章的式样）的高中红卫兵新锐们有点发楞，中央文件上只说“触及灵魂”，没说“触及皮肉”，是否应让他下跪？还没想个明白，李老师已扑上前，将梁踢倒，呈下跪之状，闸口一开，武斗便来了，红卫兵们醒悟，自己的革命激情竟不及教师，这怎了得？于是，拳脚交加，唾沫横飞，梁老师哀绝的脸上布满了仇恨的口水。初一六班的学生全都呼啦啦站起来了，既震慑又激动，跟着齐齐吼叫。这是行为规范的直观教育，革命原来可以如此，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在话下了。

与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残酷斗争相比，煎熬梁老师的那口大锅里仅是“温吞水”而已。只不过，我可以作证，以身作则去策动武斗的不是革命学生，而是革命教师。我一直在想，李与梁是否有仇隙？还有那高一女生之“性骚扰案”，彼时人们尚未学会凭空捏造，就算强词夺理，总是事出有因。只怕梁有些儿“老不修”，真干过这等事也说不定。然而，什么叫“猥亵”？摸过她的头还是摸过她的脸蛋？

很快，我就能破解出这道方程式了。

#### ◇ 人心

革命与斗争旋风一般席卷全国，社会各层均动荡不安。中共不断发社论与文件，告诫“工农群众”不要阻挠“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足见当时老百姓们都瞠目结舌，忧心国将不国，天下将倾。直到革命的巨轮碾到他们头上，这才认命。

斗争的兴头勃发起来，便有了一种上了瘾的快意。如同鲁迅笔下的阿Q，革命来时是何等的亢奋，虽然他不懂也不擅此道，但世上没有比那更易学的了。只是，没有这样便宜的事——革命永远是“盛大节日”，弄潮弄得那般开心，而不打湿自己的脚。

斗争于是下延开来，斗到学生自己头上了。红卫兵的拉杆子分帮分派乃至兵刃相见，还是

次年的事。革命之所以为革命，就是总要有人的命被革，不断地筛选出一些类别打入另册，以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我的双亲，一个是小学校长，一个是师范教务主任，当时还未被揪斗，只是“靠边站”而已。倒是我先被斗了，六月间，初一六班第一个斗争会开锣了。

幸好，文革之初，斗人的技法有待“在大风大雨中见世面”，经一轮阵仗便多一番花样。我是挨整的首选，倒也免了皮肉之苦。或许，与我的倔强抗辩亦大有关系。我被喝令站起来，照例要低头，报上父母成份，现在下场怎样，等等。其时我父母还没怎么样，胸腔里一股底气便硬朗起来。我张口就说先和大家“学习”《十六条》，拿着册子琅琅地读起来。大家便不忿，觉得此子太嚣张，但《十六条》是文献，不能不让我读。读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上”这句，众人终于忍无可忍，呵斥：真理难道在你手上吗！更有人喊：打他！竟然没有打。我想，这是自己宣读文革文献占了先机，“要文斗不要武斗”，言犹在耳，要打也等下次再打好了。

现在忆及，斗争会上的回合都很无聊浅薄，我那时才十三岁，同学亦然，实在斗不出几多水平来。只是有一个女同学的“揭发”令我极感震惊，她戟指着我的鼻子控诉，我有一次拦着教室楼道不让她通过，意图“非礼”。这话儿一撂下，登时群情鼎沸，我即刻想到梁老师的挨斗场景，高潮因此而起，这似乎比如何“反对毛主席”更为煽情，只怕要被饱以老拳了。幸而总是要我坦白交代了才动武的，我使劲回想，那是初入校门不久，时年十二，众男女同学少年心性，正玩猜拳分边的“追逐”与“营救”游戏，我如何能让她“通过”？这便是非礼，还不如说我意图强奸她好了。我陈述着，自忖不会有用处，梁老师就是这样被放倒的。果然男生们呼喝不止，很多条衣袖已捋起来了，末了居然没向我身上招呼，原来是另一半同学反应冷淡——女生们并不跟进，有的反而面露鄙夷之色。那位“险遭非礼”者长得平庸，品学更低下，总之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从女同学的脸上看出了潜台词：“他非礼你？你配吗！”

人性，人心，人格……这是我涉世以来头一次解读。我还发现，叫喊得最凶的同学，成份往往比我的“教工”家庭出身还要糟糕，大抵是跟“几类分子”那头有些瓜葛。既然斗学生斗开了头，说不定也会斗到自己头上的，便采取最激进的态势。小小年纪就学得攻守进退的法度，想想真是毛骨悚然！

由此亦可推知，梁老师之“性骚扰”，如出一辙。我无意指人家说谎，当某人已被确定为“公敌”，你又努力去恨他的时候，便可寻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细节去“坐实”他的罪名，他已是敌人，你哪怕对自己的证词有几分疑惑，却也不须内疚。

下一轮的“深揭狠批”尚未确定日子，暑假却来了。我舒了一口气，同时另一口浊气又堵上了心口。我决心要搞到一套象征着革命资格的军装，在开学那天大模大样地穿着上学校，让同学们开开眼，凭什么斗我？往后谁斗谁还难说得很呢！军装果然弄到手了，开学那天我一身草绿地在校园转悠，却没碰上几个同班同学，令我有几分扫兴。原来学校并没有复课，同学们或去外地“革命大串联”，或跟着高年级的红卫兵造反去了。

我想想，此地无命可革，不如也“串联”去吧，于是便去了。大江南北走了走，1966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不晓得，还有多少故事在等着我们这代人。

~~~~~

【史海钩沉】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 武俊平 •

红卫兵诞生不久，便冲上街头，杀入社会。1966年8月，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于是，由北京到全国，轰起大“破四旧”的运动。

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在主要街道广为张贴，后被刊载于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这篇奇文是破四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妙语高论很值得欣赏：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

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

我们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份，可作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这种浅薄的思想使红卫兵蜂拥上街，到处贴满“灭资兴无”、“破旧立新”、“砸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大幅标语。他们雄赳赳气昂昂，不可一世。所到之处，横扫一切，俨然世界的主宰。破除什么，改变什么、打碎什么，全凭他们的意志来决定。街道名称、商店招牌、工厂、医院、机关、学校、建筑物、甚至商品、饭菜的名称，被纷纷废除，一律重新作革命化的命名。各城市都出现许多“东方红大街”、“反修路”、“反帝路”、“向阳商场”、“为民医院”、“立新学校”、“东风食堂”、“工农兵饭店”、“红旗广场”、“兴无××厂”、“卫东防疫站”之类的新名号。对这种要求，公安局一律报则速批。

北京王府井大街历史悠久，其名称源于明代，是闻名遐迩的商业街。红卫兵将“王府井百货大楼”改成“北京市百货大楼”，将“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砸烂“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换成“北京烤鸭店”。似乎这种表面文章一作，世界便改造好了。文化单位的藏书、字画、文物、珍贵工艺品都被焚烧、砸碎，商店的霓虹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全部撤掉，金银首饰被赶出柜台，丝绸被扔在地上，踏在脚下，商品标签被认为不革命全都撕掉。各种化妆品被扔在街上，甚至痱子粉也成了资产阶级奢侈品。演剧用的戏服被当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垃圾。书店里，除毛泽东和马列著作外，所有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而销毁查封，街头常见烧书的火堆。无论古今中外的小说都被说成“毒草”，谁看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就是思想有问题。

理发店烫发的女人，全被红卫兵勒令剪成短发，有的乾脆被剃成光头，一个个用毛巾包着脑袋，垂泪而去。街上到处是红卫兵、妇女穿的衣裙花梢一些，被当众撕破，脚下穿高跟鞋，被立刻脱下将后跟敲掉。男青年的时髦发型一律剃光，瘦腿裤一律剪开。擦脂抹粉的妇女被当街拦住，用墨汁、污泥涂满头脸。她们羞愧悲愤，但服服帖帖。公共汽车上一个穿旗袍的女医生，年轻漂亮，红卫兵上车把她揪下，推倒在地，骂她“资产阶级臭小姐”，令她脱掉旗袍。女医生害羞忸怩，动作稍慢了点，被红卫兵抡起皮带，打得半死。一名男中学生，天生一头卷发，被指责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发型，勒令剃光。他解释说，自己的卷发自幼如此，是“自来卷儿”，剃光后长出来还照样。对方无话可说，但又不甘于错误，便狡辩：“你要真心革命，头发就会变直了。”

各地名胜古迹、仿古建筑都受到严重毁坏，寺院、道观被贴满毛主席像，佛、神塑像推翻、砸烂，经卷被烧，和尚，道士被集中起来学毛著。修女被指控“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遭到批斗和驱逐。尼姑被强迫还俗，撵出尼姑庵。有的地方竟发生勒令和尚、尼姑结婚的事。

在上海，所有教堂的十字架被砸，祭坛被毁，圣经被烧。龙华寺历代经书被付之一炬，一尊尊菩萨被砍下脑袋，偌大一片古建筑群被洗劫得残破不堪。静安寺名存实亡，只剩下几间破败的寺屋。佛教书局大量的经书、佛像、法物，大捆大捆扔到街上焚烧，从清晨烧到黄昏，柏油路被烧化，电车的紫铜天线被烧变形，燃烧发出的气味十里可闻。

玉佛寺是上海惟一幸免于难的寺庙。宗教局干部老黄维护正义，与住持苇舫巧作安排，将重要文物装箱封存，全寺上下自行贴满革命标语。又率领寺内和尚去书店请来一批红彤彤的“宝书”，购置大量红布制成红旗。待红卫兵小将来攻时，全寺和尚大开山门，欢迎小将光临本寺，批评指导。红卫兵进寺一看，和尚的革命毫不逊色，只好悻悻离去。不久，北京红卫兵挥师南下，纠集上海几路红卫兵，发誓“砸烂玉佛寺，踏平玉佛楼！”为防不测，寺里预制几块红袖章，让年轻和尚乔装红卫兵。当红卫兵人马杀来，狠砸寺门之际，假红卫兵出门对抗，喝斥对方：“不许胡来，这是我们的地盘”对方以为哪路红卫兵抢先入寺造反，便不敢造次。不料，一和尚戴的军帽被风吹起，露出秃顶上的香斑。红卫兵窥破和尚真面目，大发雷霆，感到自己神圣的革命感情遭到亵渎，重整兵马，不论男女，均以血肉之躯撞击山门。后觉蛮力不行，又找来木柱撞门。寺内和尚汇聚门洞内，结成人墙，堵住山门。门外小将久攻不破，暂时撤去，扬言次日斧劈火攻。当晚，干部老黄外出求援，请来国棉一厂的工人，连夜冒雨将寺内文物转移。又将巨型玉佛用红纸四面糊裱，正面贴一张巨幅“宝像”为玉佛护法。这些措施，使国家财产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后来，保寺有功的老黄被关进牛棚，扣上“叛徒”、“特务”多种帽子。其中一条罪名是：与和尚狼狈为奸，欺骗革命小将！

像玉佛寺这样免遭洗劫的一可以说是仅见的。无数名胜之地遭荼毒，无数稀世珍宝被毁坏。

“破四旧”为时不长，但势头凶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触及了人们的灵魂。饭馆里为了体现“为工农兵服务”，大量增加价格低廉的饭菜，质量自然也因大众化而不必讲究。为了贯彻“革命群众人人平等”，服务员不再伺候顾客，顾客前来就餐，先到柜台排队买饭菜票，然后拿票排队打饭，再端到饭桌用餐。端茶倒水一律由顾客自理，美其名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浴池里也取消了搓澡、修脚、剪指甲、送水、递毛巾等服务项目。式样别致、花色漂亮的衣服没人敢穿，麻将、扑克没人敢玩。有一段时间，商店里干脆没扑克买。因为“扑克”是外语音译词汇，而外国自然就是资产阶级。后来，由于社会对扑克的强烈需求，才有新扑克上市，但不称“扑克”，改名为“文娱片”，纸质低劣还很难买到，好纸都用去印“宝书”，或写大字报贴墙了。交谊舞被视为资产阶级流氓行为，彻底杜绝。情侣不能在街头或公园里拉手、依偎、接吻，否则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流氓抓起来。“爱情”、“亲爱的”、“吻你”、“爱你”等字眼，都被认为资产阶级情调。说脏话粗话，骂人打人，举止粗鲁，随地吐痰，不讲卫生，不修边幅，则被认为工农本色，无可厚非，文明礼貌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艺。凡属外国的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外国小说，外国电影，外国歌曲，外国商品，一律排斥禁止，西餐也受到歧视。学外语被怀疑想当外国特务，懂外语的人自然一律有特务嫌疑，听外语广播或外国华语广播都是现行反革命，国外有亲属的则被指控“里通外国”。中国古代的东西都是封建主义糟粕，解放前的东西都跟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有关。暖瓶上的花卉图案，茶壶上的古典仕女图，古代式样的桌椅，柜锁上镌刻的“金玉满堂”，年画上寿星和胖小子，春联中写的“富贵福寿”，拜年时说的“恭喜发

财”……都被从生活中剔除。人们谨言慎行、如履薄冰、时刻自省。坐在家里，全家人四处观察，细加翻检，反复琢磨，看哪里还有属于“四旧”的衣服、书籍、书签、照片、图案、用具等。一经发现，立即毁掉或遮蔽隐藏起来，以备红卫兵来检查。外国进口自行车上的金属标牌，笔筒上的古典诗句，造型美观的台灯，床单上绣的“鸳鸯戏水”、“龙凤呈祥”，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裘皮大衣、皮夹克甚至口中金牙，都属于“横扫”之列。

“破四旧”运动，使整个中国迅速走向“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社会生活变得非常单调，非常压抑。

改名换姓也是当时风行一时的闹剧。许多人为了跟上“破四旧”的革命时代，为了表示与旧思想、旧风俗决裂，纷纷弃旧名，换新名。原名忠孝、进宝、发财、长寿、福贵、有禄、高升的，因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而抛弃不用，原名莎莎、丽雅、薇拉、莉娜、美娇、若水、梦诗、雨柔的，也因修正主义味道和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弃暗投明。一时间，改名为“卫东、敬东、学东、向东、继东、捍东、伟东、朝东、念东、崇东、爱东、向红、永红、继红、爱红、卫红、勇红、全红、学红、红旗、红星、红卫、红光、红军、红日、红天、红兵、向阳、朝阳、文革、永革、继革、卫革、革命、为民、爱民、为群、爱群、向群、爱军、学军、向军、卫兵、学兵、红兵、向党、党生等革命名字的人层出不穷。

人们不仅自己改名，还呼吁别人改名。不仅改名，也要改姓。有人的姓很时髦也很方便。如姓毛就叫毛继承、毛卫东，姓马改叫马列，姓革改叫革命，姓文就叫文革。有的姓便背时，如姓蒋因与蒋介石同姓便有反动之嫌。当时，某高校的红卫兵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贴出大幅标语：“姓蒋的同志请三思”弄得姓蒋的师生惶惶惴惴，自惭形秽，只恨祖宗没传下好姓，连累自己姓错了。他们严肃对待，聚会商量，议定一起改姓毛主席的毛，并以大字报形式郑重声明。这一行动立即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写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但因旧姓名已叫习惯，新姓名一时难以叫开，有些人内心不甘于听任他们如此轻易改成毛伟人的姓，便故意仍叫旧名。这使他们后来只好照旧姓蒋，或改姓“姜”或“江”。

名字的革命化是荣耀之事，单位、学校为改名换姓者张贴大红喜报，户籍警当即办理改名手续，家庭里也为改名的人做顿好饭菜，以庆贺他们脱胎换骨、开始新生。有人干脆从毛泽东诗句里给自己请名，如“咏梅”、“飞雪”、“迎春”、“从中笑”、“万山红”、“长空”、“鸣镝”、“红雨”、“青山”、“新天”、“英姿”、“奇志”、“爱武”等。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姓名的传统，自古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但爱赶时髦、会识时务的中国人，为了革命便顾不得许多了。

改名换姓也闹出了不少麻烦和笑话。有个人原名魏来喜，为表忠心，改名“卫东彪”，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几年后，林彪垮台，再改为“卫东恩”，表示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没多久，“四人帮”批判周恩来，他又改为“卫东青”，把周恩来换成江青。不久，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揪出，他索性改名“卫东”，不保别人了。“文革”结束后，他对自己的姓名史感到丢脸，又还原旧名魏来喜。

□ 摘自《时尚五十年》

~~~~~

## 【往事追忆】

### 亲历文革若干事件

• 刘回年 •

#### ◇ “揪军内一小撮”与井冈山报导

“文革”风暴在一片混乱中度过了一年，到1967年夏天，震撼全国的武汉“7·20事件”爆发了。

所谓“7·20事件”，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王力在武汉支一派压一派，震怒了得到



武汉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把王力扣住。王力被扣，在林彪、江青、陈伯达等看来这还得了，林彪拍定：“武汉‘7·20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7月2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号称百万人的欢迎王力、谢富治等回到北京的大会。林彪亲自参加大会。会上高呼：“揪出武汉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向王力同志致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斗争的矛头转向军队。后来的事实说明，林彪和“中央文革”从“7·20事件”开始，便着手“揪军内一小撮”了。

野心家的阴谋在被揭露之前，群众是不可能知道的。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的欢迎大会，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了报导。和往常一样，我早早地赶到现场。在天安门城楼下，我见到了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刘福，这位江西籍老红军和我是同乡，他领我上了城楼。大会开始前，林彪摇着“红宝书”上来了，扎着绷带的王力以及谢富治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会上，被安排发言的北航造反派组织、首都工代会和武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讲话中，都点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大会通过的《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通电》，明确提出与“军队内一小撮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大会报导是由“中央文革”直接控制的，报导基调、审稿、定稿，都由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定。在那个年代，为审稿事，我与这几个“文革”头面人物都打过交道。记得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他们几人将稿子改定，王力还从室内出来特地对我说：“稿子就照改定的发，不要动。”天安门广场大会的报导，也是由他们改定后退新华社发的。林彪和“中央文革”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浪，确实也“英雄”了一番。

我们当记者的不可能了解林彪一伙的阴谋，仍按常规考虑问题。“7·20事件”结束，“八一”临近，其时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也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0周年。由于长期搞军事报导的习惯，编辑部研究拟大力宣传解放军的历史功绩和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意义。总社决定由我带队，组成有对外部胡根康同志和福州军区分社赵玉庆同志等参加的报导组赴井冈山采访。那时，各地武斗升级，我们乘火车过济南后就受阻了，一路走走停停，一个星期后才赶到井冈山。在井冈山，我们抓紧采访，赶写了一批稿子。但当我们回到北京时，发现短短的20来天的政治气氛又发生了变化了。编辑部正式传达：“揪军内一小撮”不提了，毛主席批示：“还我长城”。虽不是正式传达，但内部已议论开了：王力、关锋被打倒了。编辑部敏感地注意到，王力是“中央文革”的宣传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长），为控制新闻宣传，下达“指示”和审发稿子是经常的，但这些都突然中断了。在那个斗争激烈的年代，没有声音就意味着垮台。

王力这位红极一时的大左派，不久前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以“英雄凯旋式”的姿态出现，忽然垮台了，垮得如此之快、之突然！后来，我们从军队和其他方面了解到，王力之所以垮台，其主要罪责就是和林彪、陈伯达、江青、关锋等炮制“揪军内一小撮”，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在全国掀起新的斗争狂澜。他们在“八一”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打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幌子，在各种场合、军内外报刊，大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气氛闹得十分紧张。特别是由陈伯达、王力、关锋直接掌管的《红旗》杂志，在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明确提出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社论写道：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林彪同志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军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打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不仅如此，社论还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么一来，不但朱德、周恩来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外，而且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却无法“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在上海的毛泽东看了这篇社论，震怒了，他写下了“大毒草”三个字，并批示：“还我长城”8月12日，毛泽东的批示传到北京。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写下批示：“不用！”

毛泽东的震怒，一下便把王力以及与他一伙的关锋这两员“中央文革”大将从权力的顶峰掀了下来。他俩是“中央文革”最先垮台的大左派。

围绕着“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可能是“文革”中一场不小的风波。毛泽东信赖军队，在他看来，“文革”中党委和政府可以瘫痪，而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国家的“钢铁长城”，是保证“文革”进行下去的重要力量，军队乱了，局面更不可收拾。而林彪和“中央文革”惟恐天下不乱，要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涛，进而把党内、军内一切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打倒，这才能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在这场斗争风波中，毛泽东洞察了他们的阴谋，并及时迎头痛击，予以粉碎。就是今天来评说，这也是他老人家的一大功绩。如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阴谋实现了，人民解放军搞垮了，也许共和国的大厦也早就倾覆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 ◇ 在干校“改造”朱穆之

1969年岁末，新华社急匆匆地在山西永济的黄河滩上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个连队，数百名干部，加上家属孩子上千人，离开北京来到黄河滩上“扎根”。我不是受冲击的老干部，但因军事部要出一名带队的干部，部门领导决定我下干校接受锻炼。我是军事记者，又年轻，从一开始便担任四连连长，后来又担任校党委委员。四连住在一个叫郭李的村子。连队由9个业务部门的99个干部，加上家属孩子一百多人组成。除了少数骨干外，大多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同志，其中有所谓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特嫌分子”、“黑权威”等等。我和他们几乎都不熟悉，但同住一村，天天同吃、同劳动，慢慢也就熟悉了。我们连队担负的任务是：烧窑，制砖做瓦，烧石灰，为干校盖房子提供建筑材料。这是强劳动的重体力活，不要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对农民来说也是够累的。由于我的双重任务：既要负责连队干部“改造”，又要自我“改造”，在繁重的体力活面前不仅不能特殊，而且要起带头作用。那时的路线是“左”的，我也毫不例外地执行了。但通过共同的劳动，我们却逐步消除了隔阂，建立了很真挚的友谊。无论寒暑，我都和大家一起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与泥巴打交道，手工制砖，肩背砖坯，一上肩就是一两百斤重，一天下来，真是满身泥土，一身汗水。至于当窑工那就更辛苦了，高温操作，窑内闷热，窑灰、煤灰，把人熏得像黑人。劳动强度大，生活又很差，我们吃的常常是粗粮咸菜，油水很少。半年下来，我的体重便掉到80多斤了。现在听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左”得出奇的气氛里，我们确实是自觉去吃这种苦。1970年夏天，我爱人来干

校看我，从我岳母家带来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要杀了给我吃。但我觉得这是脱离群众，这只母鸡不能吃，二话没说，便把母鸡送给了房东老乡，一餐不拉地和大家在食堂吃粗粮咸菜。不仅如此，我们还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天，我和指导员梅柏春同志（新华社对外部编辑）组织大家在一个黄土高坡上开控制砖的泥土，我们俩正在前面开挖，突然，高坡上一大块硬土块砸了下来，正好把老梅压在下面，我也差一点被砸着。当我们拼命挖开土块后，老梅已牺牲了。不久，老干部吴化学同志的小儿子上中条山砍柴，因为不熟悉山路摔在岩石上，摔破脑袋，我随车抱着他去县医院急救，途中孩子就断了气。吴化学夫妇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内心很悲痛，但强忍着，不敢有太明显的痛苦表示，因他们那时也是被“改造”的对象。我也掉了泪，但又没什么帮助他们的办法。

一天，我在校部参加党委会，会议结束前校领导说了一件事，说总社军管小组决定将朱穆之下放到干校，问哪个连队愿意接受。校领导是征求意见，不是分配。朱穆之同志在“文革”中是新华社最大的“走资派”，监督劳动。在那个年代，人们尽可能不和他沾边。所以在校领导讲完后，都不吭气。我感到大家都不想要，这不是个办法，便说：“那就到我们四连”其实，朱穆之也不认识我，“文革”前他是总社领导，1965年开军事记者会议时到会接见过大家，我偶尔去社长办公室送过稿子，没和他说过话。但朱穆之同志传奇的革命经历，我早有所闻，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勇敢分子，冒着军警高压打头阵，以后在刘邓部下率部奋战过。我不相信这样的老革命是坏人。于是斗着胆子把他领到连队。他和爱人周萝、小孩一起被赶了下来，我安排副连长阎振国同志去车站把他们接来，安顿好，并和他聊了聊，鼓励安慰他。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要先开批判朱穆之的会。以免人家说右倾。我坚持说，先干一段，以后再安排还来得及。就这样搪塞过去了。我当时把朱穆之同志看成了是连队的一员，也没有对他加以特殊照顾。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50多岁的人了，也和大家一起干重体力活。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久，我便结束了近两年的干校生活回到总社，朱穆之同志后来在干校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 ◇ 选当王洪文秘书的风波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位列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一跃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三号人物。这时的王洪文正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成为世人瞩目的政治明星，位高权大，炙手可热。王洪文当副主席以后，便拉开了抓大权、管大事的架势。增选秘书，扩大秘书班子就是一项重要举措。王洪文当时究竟有几个秘书，我不知道，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负责人、黑笔杆子肖木一直在王洪文身边工作，是他秘书班子的头头，这早有所闻。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被卷入选拔王洪文秘书风波的。

1973年12月25日，一个突如其来的调令一下把我弄懵了。那天上班后，总社两位领导找我谈话，宣布了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调令：中央决定调刘回年同志到王洪文副主席处担任秘书工作。两位领导对我说了些勉励的话，但我因毫无思想准备，激动不起来，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好。当天晚上，我静下来后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文字，就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心潮翻滚，无语凝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长期以来，我的心愿和追求的目标是当个记者或编辑，怎么要我去这么高的地方当秘书呢？我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和生活习惯，都是不适合、不胜任的，也是我不愿意干的。此事前景如何？留下的是未知数。现在需要的是沉着、冷静，好好思考，把握住自己。”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

“刘回年要到王洪文副主席那里当秘书”的消息传出后，社内社外熟悉的同事或朋友从说话到表情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多数人是打哈哈，表示祝贺，有的说“到上面去当秘书有利于发展”。有的说“这是新华社的光荣”。但也有同志拉着我悄悄地问：“是怎

么选上去的？到那里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有的还关切地说：“这一步可得走好。”

如何走好这一步，这对我人生之路至关重要。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从组织原则来说，这是中央下的调令，到副主席身边去工作，这是政治问题，必须服从，我不能说半个“不”字。但从个人来说，疑虑甚多，非我所愿。我很快冷静下来，先搞清了这是组织系统推荐的。我与王洪文没打过交道，不熟悉，也不是通过别的途径选上的。据了解，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下令要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宣部选几个有文字能力的同志去他办公室，分别担负某个方面的调研工作，为他提供所需情况。我移交了工作，党支部给我开会做鉴定，大家给我说了一通好话和鼓励的话。我没有急于去报到，仍然上办公室。主要是和熟悉的老同志交换意见。老军事记者阎吾、成一是老同志，我们长期共事，是我的决 d 师益友。那几天，我们常常在办公室关起门来谈到半夜。因为是朋友，相互信赖，谈话放得很开，从政治形势、发展趋势、军队的反映，以及我去那里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都进行了充份的、毫无保留的分析。当时我们的认识有限，也不知道有个“四人帮”，对“文革”不敢否定。但我们都是军事记者，长年在部队跑，和解放军指战员接触多，更多的是从直观上、从我们所掌握的群众情绪上分析问题。我们谈到，部队许多同志认为，王洪文当副主席不服众，“上海帮”控制不了局面（那时部队就有“上海帮”一说），迟早要完蛋。阎吾同志甚至说，要是调到周总理那里去，我赞成；调到王洪文那里，最好不要去。去了就没有退路了。我们思想一致，形成了共识：采取拖的办法。

半个月过去，中组部来电话催我去报到。看来拖是不行了，我只好去报到。在那里，我见到了我在保定采访过的一位县委书记，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在中组部任处长。我对他说家里还有点事，请他帮我去说说再请几天假。这样我又拖了下来。其间，我去了几次中组部，专门去找袁木同志。袁木是新华社的老记者，过去在一起工作过，当时已调入中组部任研究室负责人，与上层联系较多。我找他想请他帮帮忙。一天，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因为熟悉，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讲了我的想法与愿望，希望他帮我出出主意。袁木同志很热情，听我讲完后，便满口答应：“小刘，既然你不愿意，我来给你想个办法，你给王副主席写个报告，陈述你的理由，我给你转上去。”他还给我讲了报告如何写合适。从中组部回来，我便赶紧写报告。当时报告的底稿仍在，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王副主席：首长好！

我叫刘回年，是新华社的军事记者，这次有幸被选调到首长处当秘书，深感荣幸。考虑到首长处工作，事关重大，要求高，本人从学校出来后一直当记者，自由主义惯了，不严谨，恐难以适应，贻误工作。如可以，我还是希望继续当记者。恳请首长准予。

此致

敬礼！

新华社 刘回年

1974. 1

报告不长，但颇费斟酌，一方面不要说错话，使他不高兴，给我加上什么罪名；另一方面又要说服他，让他顺利放我回来。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就写成这样了。报告写好后，我交给袁木同志。他说，可以了，有情况我给你打电话。袁木同志将报告送上去，我的心里一直是悬着的，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呀一天，袁木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报告批了，王副主席在上面批示：“尊重本人意见，退新华社。”我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说：“你给新华社说清楚，

把关系办回去就行了。”我高兴地当即将消息告诉阎吾同志，他叫我赶快去找社领导汇报，因为要他们同意我才能转回来。社领导听后都表示支持我回来。

□ 摘自《重大事件亲历》，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

~~~~~

## 【童年旧事】

### 那座恐怖的桥

• 王永明 •

1962年，我出生于四川省北部广元县，学龄前的童年在脑海里已模糊不清，唯有一些文革的片段还记忆犹新——都与武斗有关。

那一天不同寻常，左邻右舍，男女老少，聚集在街道边，院子里，议论纷纷，神情严肃而激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注定要发生大事的气氛。我们小孩子无忧无虑，把群聚的地方变成了难得的嘻戏场所，我们环绕在大人周围相互追逐着，雀跃着，兴奋不已，还不时缠着父母买进城农民卖的李子……

近晌午时分，两辆载满人的解放牌汽车一前一后风驰电掣般相随而来，朝附近的军队驻地驶去。大约十分钟后，从军队驻地的方向陡然传来了枪声。开火了！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那一刻，大人们不再议论，小孩子停止了嘻戏玩耍，所有人引颈翘首朝向枪响处，凝神屏气地料了望。什么也望不见，唯有枪声渐渐逼近。了望的人们变得躁动不宁，没有多少时间好耽搁了，转瞬间，那两辆满载着人的卡车又疾驰而来，这一次，它们边飞速行驶，边互相射击。枪声就在视野内爆响，人群顷刻做鸟兽散，人们往家的方向拼命奔跑，进屋、关门、上锁。之后剩下的事情祇有一件：听着那门外世界惊天动地的枪声。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时刻即是我的家乡文革武斗的开始。从那一刻起，老百姓像受了惊吓的兔子，龟缩在巢中，开始了漫长时期的武斗避难。

我家乡的县城广元依山傍水。山不太知名，可能叫红土垭，水却是嘉陵江。江水从山的峡谷中蜿蜒川流，县城则沿江岸分布成狭长地形。这样一个恬然美丽的地理环境在武斗的年月里变得十分可怕。江岸两座不高的山分别被对立的两派占领并长期把守，山上筑满了工事。持枪的人们日夜对峙，不时开枪相互射击。那一带的山势不高，峡谷极窄，居高临下，县城因此全在射程之内。不少人有过在枪林弹雨中奔跑或躲避的经验，但如果说在枪林弹雨下过生活的经验，恐怕就要数我家乡的居民了。平日里，子弹不时在头顶呼啸穿梭，城里的气氛可想而知。人们非到万不得已，足不出户。即使禁闭在家中，窗户也用厚棉被遮挡着。时常有带枪的人在门外走来走去，这同样让人害怕，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了兴致会向老百姓开枪？

对小孩子来说，这样度日毕竟难熬。不打枪的时候，我就会出来，在家后面的小院里玩。那天阳光明媚，和姐姐玩的是“跳房”游戏。我们专注于脚下的“房子”，跳啊跳，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间，就在我们身边，一声爆响震耳欲聋，一阵清烟顷刻笼罩后院。我和姐姐被惊吓住了，顿时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又是一声向，这回是我的父亲，他猛然推开房门，冲到院里，扑向我和姐姐。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他一手一个不由分说地拽进房内——地上画的“房子”虽然令我们忘乎所以，毕竟祇能跳脚，不能藏身。我们缩在自己家真正的房子里，过了很久。后来父亲慢慢打开门，轻轻走了出去。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颗子弹，一颗真正的子弹！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时一颗古铜色的，螺旋形的子弹，有大指头大小。我当

时当然不知道如今我会写下这些文字，记载那一次的历险。不过，当回忆那次经历的今日此刻，我仍心有余悸。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全家步行去十里外的火车站乘车。我家五口人，那年弟弟三岁，我五岁。姐姐八岁。武斗正如火如荼，这样的一家人（连同行李）在那样的户外长途，并非易事。火车站在嘉陵江对岸，途中必经一座桥。连接江两岸的这座大桥的两端，和依江而立的两边山一样，分别为对立开仗的两派把守。过桥之前，我们被守兵停下，大人小孩连带行李里里外外彻底搜查后，总算放了行。过桥了。桥上的人行道是由一条条脚掌宽的木板拼接成的，很多木板已被抽掉了。天已黑尽，桥上稀疏的灯如鬼火似地，发出昏黄的光。离家出门，暴露在枪口的紧张悬在心头，搜查时的惊吓尚未平息，爸爸背着弟弟，妈妈牵着我，拿着行李，姐姐独自跟着，我们就过桥了。心惊胆战，桥下深处江水滔滔，桥上四周愁云惨雾，前方一片漆黑，不见尽头，仿佛许多枪口对着我们的胸膛，背后漆黑一片，仿佛也是许多枪口对着我们。不敢回头，不敢停步，走快了怕掉下去，走慢了怕背后的枪口射出子弹……，那座桥，那座充满恐怖的桥，对五岁的我来说是太长太长了，好像永远也走不完。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总编：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